

唐代文人心态史

池万兴
刘怀荣 著

长
寿
出
版
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唐代文人心态史

池万兴 刘怀荣 著

长
春
出
版
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唐代文人心态史 / 池万兴, 刘怀荣著. — 长春:
长春出版社, 2015.1
ISBN 978-7-5445-2892-4

I. ①唐… II. ①池… ②刘… III. ①文人-心理状
态-思想史-中国-唐代 IV. ①K825.6②I209.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287832号

唐代文人心态史

著 者: 池万兴 刘怀荣
责任编辑: 谢冰玉
封面设计: 魏 晋

出版发行: 长春出版社

总编室电话: 0431-88563443

发行部电话: 0431-88561180

邮购零售电话: 0431-88561177

地 址: 吉林省长春市建设街 1377 号

邮 编: 130061

网 址: www.cccbs.net

制 版: 荣辉图文

印 刷: 长春市东文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字 数: 200 千字

印 张: 13.25

版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8.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厂联系调换

印厂电话: 0431-84850509



导 论

治文学史者对前人“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论断，多愿意不厌其烦地加以称述，然进而言之，之所以“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根本原因又在于“一代有一代之文人”。因为一代文学之形成，表面看来虽然是一代政治、文化等诸多方面的要素合力作用的结果，但事实上，文学作为文人创造的精神产品，它在诞生之前，不论曾受到过多少外在的影响，也不论这影响有多么深刻，它们终须经受作者情感的过滤和心灵的淘洗，内化为一种难以清楚言说却是实实在在存在的文化心态，而文学便是这一文化心态再度外化的直接结果之一，也是这一文化心态较为精致的表现形式之一。当然，同样可以被看作是这种表现形式的，至少还可以包括文人的思想认识、言论和行为方式等。这也就是说，文化心态或者更直接地说——文人心态，它一方面是对外在的现实和传统的种种刺激做出反应，并对之消化、吸收，最后经高度整合而形成的一种自具体系又不乏时代共性的的心灵状态；另一方面它又对文人



的处世应物、精神创造和理性思考等诸多方面的展开方式和主导意向有着整体上的规定性和制约性。在此意义上，文人心态是极富统摄力的，它与文学的关系也要比许多外在的现实和传统要素更直接，更切近。这使我们从文人心态入手来研究一代文学，或从文人生活的方方面面来追踪、逼近一代文人心态，在学术的层面上有了实在的价值和意义，而不像人们惯常所理解的那样，仅仅把这项研究视为无根底的玄谈。在我们看来，心态研究并不玄虚，相反乾嘉学派的考证功夫在这里也同样可以大显身手，只不过“心态”本身所具有的动态性和隐秘性使这一研究不可能得出像考证某人生卒年那样确切的结论（实际上许多历史人物生卒年的考证也无法得出确切结论或者结论远不止一个，甚至不同结论有时还是相互对立的）。从研究者的角度说，我们需要做的是一种逆向式的考察，即从受心态支配、制约的，可见的文人生活的方方面面来追寻无定形、不可见的文人心态。显然这样的研究首先要有一种综合的态度和视野，并在众多的史料背景下去体验、去推考已经逝去的心灵世界，而且永远只能逼近它，只能得其大概，不可能使结论完全精确化。这虽然是社会科学研究的共性，但在心态的研究中尤为突出。此外，对心理学、美学、心态史学等学科理论的吸收、融化，无疑也是必不可少的。因此文人心态的研究实际上是集行为方式与价值观念、理性认识和感性体验及现实生活与精神创造等多方面的内容为一体的一种综合性研究。

在文人心态研究中，文人与文人群体的文学作品无疑应成为我们关注的重点，因为在显现文人心态的诸种要素中，文学作品以其独特性最直接地记录了文人心态在特定时空中的样态与变化，为我们考察文人心态提供了第一手的感性材料。这使得文人心态的研究与文学史的研究有着许多重合之处，但二者的差别依然是主要的。在文学史的研究中，心态的研究对文学史的发展做出心理学的说明，与文学无关的方面我们可以不论；而在文人心态的研究中，我们关注的只是文学作品中体现了心态的部分。因此两者即使在涉及同一材料时，讨论问题的立足点及得出的结论也有可能完全不同。这决定了文人心态的研究必然会从另一侧面对文学史的研究提供有意义的成果。

中国古代的文人，常常又是儒者与官僚，而许多文人除能文之外，在琴、棋、书、画等多种艺术领域也多有所独擅，甚至样样精通。因此，文



人心态的研究同时也必然会给政治史、思想史和艺术史乃至文化史的研究提供新的思考。特别是对认识中国知识阶层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对民族理想人格的现代化重铸，应有不可低估的作用和意义。

二

唐代，从某种意义上说，早已成为强盛、辉煌和发达的代名词，成为中国历史上令我们每一位中华儿女都深感自豪的一页，以至直到今天海外华人仍以“唐人”名街，借以标明自己的身份。而唐三彩、唐诗等艺术精品更是让人时时感到那个已经逝去的时代仿佛依然触手可及。不过，对于现代人来说，唐代毕竟只是中国历史长卷上的一个片断，她切近而遥远，令人神往却终归和我们有着整整一千多年的阻隔。因此，我们要在这里谈论唐代，谈论唐代文人，并描述他们充溢着才情与性灵的心灵世界，无异于在漫漫无边的黑夜中借助微弱的星光寻觅精神的碎片，而这些碎片又深埋于泥土之下，与瓦砾、石块混杂在一起，稍一不慎，即可能认假作真。这注定了我们这项工作的风险性比一般的学术研究要大得多。之所以这样说，还因为心态史的研究在国内学术界迄今尚不多见，这使得我们只能在缺乏参照的前提下去展开自己的尝试。此外，与学者们对魏晋文人精神世界的格外关注相比，对于唐代文人，我们至今还是把他们的生活和作品作为研究的重点，而对于这一代文人的整体观照，无论在研究的理论深度，还是在研究论著的数量及质量上，都与对魏晋文人的研究有着较大的差距。把两种研究对象稍加比较，不难发现，这种研究兴趣和研究现状的不平衡实在不能算是正常的。在关于中古和唐代的文人和文学的研究中，我们现有的最常用、最典型的术语，莫过于“魏晋风度”和“盛唐气象”，前者是对一代文人精神风貌的概括，后者则是对盛唐文学的审美评价。这种对两个时期文人与文学研究的不同侧重点，至迟在以鲁迅为代表的那一代学者那里就已形成，直到近年仍未见有大的改观。如果说“五四”学人是从接受西方自由思想的大前提下选择魏晋文人作为研究对象的话，后来的学者们对魏晋文人的偏爱恐怕更多的是出于对学术传统的自觉继承。当然这里还应充分考虑到魏晋文人的独特个性对现代学者的吸引力。正是这些外部的和内部的因素使得魏晋风度的研究成了学界的热点之一。遗憾的是，一方面，魏晋风度的研究者很少有人从动态发展的角度去系统探讨魏晋风度



对唐代文人的影响；另一方面，唐代文人虽不乏独特的个性，但如魏晋文人研究得以兴盛的那种外部条件却始终未曾具备，致使自 20 世纪初以来的几代学人大都把目光集中于唐代的作品，尤其是诗歌上，对于作品的创造者——唐代文人的精神世界的探讨，特别是对有唐一代文人的整体性的观照反倒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其间唐诗独具的魅力无疑在客观上决定着研究者兴奋点的形成，但是作品研究既不可代替文人研究，其理论的升华在很大程度上也还有赖于后者的深入与突破。事实上，唐代文学研究中存在的不少问题也确与文人研究的不够深入密切相关。即使仅从唐代文学研究的深化而言，对唐代文人心态给予充分的关注也是极为必要的。

唐代是诗歌的时代，文人的思想、情感都借诗歌的形式表现出来。而在诸种文学体裁中，诗又是最富抒情性、最具主观色彩的文体。更为重要的是，唐代是一个思想解放、文禁松弛的时代，与其他时代相比，文人享有更大的自由，可以尽情地倾吐内心的喜怒哀乐。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唐代文人向我们呈露出更为丰富、生动的内心世界。我们有什么理由对此视而不见呢？“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心灵世界原本就是可感而不可见，极富虚幻、迷蒙特征的，何况我们面对的是迷于诗、困于情的有唐一代文人。读懂他们当然需要更多的学者的共同努力。但我们深信本书的尝试也不会是毫无意义的。

三

研治思想史和文化史的学者往往比专事文史研究的学者更能够清楚地感觉到：唐代在思想史、哲学史上的地位远不如其他朝代，尤其是同相邻的魏晋和两宋相比，更是逊色得多。自思想史、哲学史的角度而言，这自然是令人遗憾的不足。但从文学史和心态研究的立场来看，这反倒成了唐人的长处。因为从实际情况来看，唐人在思想史、哲学史方面的欠缺，与其说是他们缺乏相应的素养和思考所致，倒不如说是他们基本上就没有养成理性的思想探求和哲学思考的习惯，或者纵然有这种探求和思考，也往往并不把它作为思想史或哲学史的命题以思想家和哲学家独有的方式来表达，而是自觉不自觉地把它内化为一种审美感受使哲学思考和思想探索转换为一种富含哲理的诗意美，最终以诗的形式表现出来。因此，从整体上来看，唐人的思考方式、感受方式乃至表达方式都是富于诗性特征的。



在此前提下，道家自然无为、“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人生哲学作用于李白，形成的不是老庄式的高人而是“诗仙”；佛禅任运自然、物我两忘的宗教思想深入于王维，修得的不是释迦式的“正果”而是“诗佛”；至于儒家“国身通一”“民胞物与”的道德精神影响于杜甫，产生的也不是孔孟式的圣人而是“诗圣”。虽然，这三位诗人还只是唐人中的特例，其他的许多唐代文人不一定像他们这样典型，但是从他们以诗为主要的表现形式吸纳、融汇其他文化财富，以完成自己的精神创造的基本一致的途径和方式来看，从后人对“诗仙”“诗佛”“诗圣”的普遍认同来看，我们都不难发现，在唐代，诗有着多么强大的渗透力！在文人心灵世界中占据着多么重要的地位！如果再考虑到三位大诗人在唐代诗人中的代表性，以及“诗仙”“诗佛”“诗圣”乃唐代特有的诗歌现象，我们说唐代文人比其他朝代的文人更富于诗性智慧，或者说，相对而言，他们的思维方式更近于诗性思维，就是有充分的依据的。泰纳在《巴尔扎克论·伟大的人物》中曾经写道：

假如你认为感受性是最重要的部分，那你眼中便只见强烈的感情，你描写的便将是纵横的眼泪，深细的情绪。你对自然的看法，便形成你对美的看法；你对现实人性的概念，便形成你对理想人格的概念；你的哲学思想便形成你的艺术观。^①

以此来说明唐代文人心灵世界的整体倾向，也并无不妥。只不过这里的“感受性”应当更具体化为中国古代以“感物”为审美基础的诗的“感受性”。这本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而在唐代文人身上则表现得更为突出和普遍。其最直接的原因，则在于对“感受性”的重视，或者说对诗性的执着不仅仅是唐代文人精神创造活动的重要特点，也同样体现在他们的现实生活中，使他们的生活也呈现出浓郁的诗意。这一点在唐代不同的时期又有各自不同的趋向，但比较而言，则以盛唐时期最为典型。这不仅是因为盛唐时期已完全消除了魏晋士人追求个性自由所带来的一系列矛盾与危机，持续数百年的忧患感、恐惧感均已平息；也因为新的文化道德秩序的重建还没有达到足以压抑人性、羁缚自由的地步；此外，政治上相对的清明，则使前两方面所能够带来的自由和焕发的生气都得到了极为有效的展现。如此种种，遂使盛唐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独特的时期。这

①[法] 泰纳《巴尔扎克论》，《古典文艺理论译丛》1957年第2期。



也正是盛唐诗成为中国古典诗歌之典范的深层原因。而从更大的范围来看，整个唐代在中国历史上也同样是独特而非常独特的，那么，探讨这个独特时代富于“感受性”的文人心态，对于我们更深入地了解中国人、中国文化和中国诗歌，都无疑具有其他研究所不可替代的作用。

四

任何一个时代都只能在历史的维度上被认识，任何一个时代的发展都离不开历史智慧的指引。在中国历史的全史中来观照唐代，我们发现，它与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处在非常相似的位置。要说明这一问题，首先得从中国文化的几次大总结谈起。笔者认为中国文化发展至今已经历了三次大总结。第一次文化总结完成于传说时代直至夏、商时期，属于以巫术、宗教、神话为核心的巫文化体系^①，它以巫术仪式和神话传说为载体，对人类早期的精神信仰、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等等做了全面的整合，为后来文化的发展、创新奠定了基础。但从商末周初起，这一文化体系随着先秦理性精神的崛起就已开始分化，至春秋战国则全面崩溃，而诸子百家的理论创造与学术争鸣，则既是对旧的文化体系的全面突破，也成为新的文化总结的必要前提。

中国文化的另外两次大总结分别完成于西汉和两宋，形成了董仲舒的天人感应神学体系和宋代理学。从整体上看，两次文化大总结之间，文化的大分化、大转型必然催发出文化的创造与突破。第一次文化总结与第二次文化总结之间的诸子百家争鸣，第二次文化总结与第三次文化总结之间的魏晋玄学，都在打破原有文化格局的同时，为新的文化重建与总结提供了富于创造力的新资源。第四次文化大总结虽然还未发现，但是第三次文化大总结所确立的文化体系自晚明首次受到冲击以来，我们又经历了自近代开始的，在与西方文化激烈争锋、碰撞的背景下对旧有文化的重估、突破。如果以前两次的文化分化、重建过程为参照来反观这第三次文化分化和重建的基本走向，我们可以发现，前两次文化分化、重建的周期均在一千年左右（第一次从公元前 11 世纪的商末周初至公元前 2 世纪的汉武帝年间；第二次从公元 2 世纪的汉末至公元 11 世纪的北宋）。如果这一历史周

^①也有人认为图腾文化是人类最早的文化体系，参何星亮《中国图腾文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395—396 页。



期有其客观的规律而非纯粹的巧合，那么，从晚明算起，第三次文化分化与重建的进程现在正处于中途，这与从汉末开始的第二次文化分化与重建在唐代进入中途恰相仿佛。当然，如果仅有这一机械的相似，还不足以说明我们的时代与唐代具有相似性或者说处在相似的历史位置上，我们之所以把这两个时代放在一起来审视，还因为从民族文化心理的发展看，这两个时代也有许多相近的地方。

首先，两个时代都已完成了由全面否定、批判传统文化而终于能在新的历史高度重新认识本民族文化的历史使命，这是新的文化重建的开始。也就是说，两个时代都经历了“破”的阶段，进入了“立”的阶段。

其次，两个时代都已从打破旧的文化体系所引起的种种信仰危机、心理失衡与迷惘中摆脱出来，知识阶层以及民众心理从整体上得到了有效的调整，逐渐趋于平静。

再次，两个时代都具有价值多元化，思想相对开放、活跃，在国力增强的前提下对各种文化都能客观地对待、合理地吸纳的特点。

上述几方面，都使我们这个时代与唐代有了某种必然的联系，换言之，唐人进行文化重建的整体思路和具体得失，对于我们今天的知识阶层而言，就有可能具有一种非常特殊的意义。因为历史文化智慧可以使我们减少迷失方向的危机。虽然，现代社会与一千多年前的唐代毕竟有着太多的不同，但是人类思考的许多基本问题却依然有不可忽视的一致性。在此意义上，唐代文人心态的研究就不仅仅是纯学术的话题，而是自然包含了对现实的关注与思考。当然，这种“温故而知新”的工作是需要几代人从多个领域来完成的。本书所选取的只是向不为人重视的一个小小的侧面，倘能于读者的思考有所助益，便不为妄作了。



目 录

导 论 / 1

第一章 迷失与重建：理想人格的艰难探索 / 1

- 一 心灵世界新声与老调的同奏 / 2
- 二 理想人格的艰难探索 / 13
- 三 忠义豪侠的人格精神与谄媚取荣的双重人格 / 21

第二章 任性与深情：理想人格的全面成熟 / 28

- 一 价值观的更新与心灵的自由 / 29
- 二 自我的再发现与美的沉迷 / 49

第三章 奋发与逃遁：理想人格的时代转换 / 66

- 一 关注自我与归心自然 / 67
- 二 追寻中兴梦——元和文人的群体自觉 / 101

第四章 乐天的痛苦与逍遥 / 111

- 一 愿为辅弼、大济苍生的积极用世心态 / 112
- 二 独善其身、乐天知命的苟安心态 / 115
- 三 恬淡去欲、心如止水的佛老心态 / 118

第五章 退之特立独行的怪异心态 / 121

- 一 救困扶危、匡正时俗的济世心态 / 121
- 二 刚毅坚韧、自强不息的乐观恒定心态 / 123



- 三 尚怪爱奇、特立独行的倔强心态 / 126
- 四 佞佛与礼佛的矛盾心态 / 128
- 五 汲汲富贵，谄媚干谒的世俗心态 / 130

第六章 李贺的抑郁气质与躁动心态 / 132

- 一 宗孙意识与功业心态 / 132
- 二 由功业心态走向对外部世界的占有欲望 / 135
- 三 体弱多病带来的个体生命的危机感所造成的生与死的矛盾痛苦心态 / 136
- 四 求仙——超越生死的道路 / 139
- 五 抑郁躁动心态与对生死的变态心理在诗歌创作中的表现 / 141

第七章 失落与超然：理想人格的多元质变 / 144

- 一 从执着、激愤到感伤忘世的心态走向 / 146
- 二 清醒的认识与回天无力的旁观心态 / 156
- 三 心灵开拓与哲理体悟 / 163
- 四 绮艳情思与清高遁世的双向心态走向 / 170
- 五 冷淡内省心态的细微化表现 / 178

第八章 李商隐：心灵世界的开拓者 / 185

- 一 独特的时世、家世、身世所造就的悲剧性的感伤心态 / 185
- 二 “欲回天地”的雄心与“一生襟抱未曾开”的遭遇所产生的矛盾痛苦心态 / 187
- 三 深沉苍凉的人生悲慨 / 189
- 四 离愁别恨中的感伤心态 / 191
- 五 感伤心态的朦胧化、模糊化艺术表现 / 193

主要参考文献 / 195

初版后记 / 198

再版后记 / 199



第一章

迷失与重建： 理想人格的艰难探索

初唐文学从唐代开国至景云之间大约 90 余年，可以分为三个互相联系的阶段：唐朝建立至高宗永徽初年（650 年前后），约 30 年，为第一阶段；从永徽初至调露年间（679 年前后），约 30 年，为第二阶段；从调露年间至景云中 30 余年，为第三阶段。^① 这三个阶段走过了三代文人。这三代文人的心路历程及其诗文创作，表现出明显的由南北朝向盛唐过渡的特质。一方面，新的时代风气不可能在极短的时间内建立起来，因此六朝遗风在唐初得到了一定的继承与发展；另一方面，新的王朝必然面临新的形势，传统的仕隐、出处等立身处世原则需要进行重新审视，新的价值体系需要建立。可以说，初唐文学就是在对旧的文学观念和思想意识不断整合创新、扬弃拓展的基础上发展演变的。由于缺乏相对成熟的价值体系的干预，加之人格结构上的差异，初唐文人的心态在探索的进程中表现出过

^① 此处参考了罗宗强先生《唐诗小史》的分期法，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



渡特质的同时，又呈现出明显的多元化倾向。

一 心灵世界新声与老调的同奏

在初唐第一个30年中，齐梁绮靡的文风得到了一定的继承与发展。唐太宗及其重臣们自觉地模仿南朝的文学艺术，对南朝遗留的风气表现出认同心理，御用文人的品格在许多文人身上也有所体现。他们的诗作多呈现出小巧细腻的旨趣，而缺乏宏壮之声。但是，初唐社会在精神风貌上毕竟与南朝不同，经济日益繁荣，人民安居乐业，门阀士族的垄断地位也受到一定限制，蒸蒸日上的大唐国运使当时的文人对未来充满信心，在心态上便表现出蓬勃昂扬的气势。因此，他们对南朝文风的模拟仅仅体现在艺术风格的层面上，其精神气质已经产生了极大的改变。如同是作宴饮游赏诗，南朝士人是“但使良园广宅，面水带山，饶甘果而足花卉，葆筠篁而玩鱼鸟”，“或出或处，并以全身为贵；优之游之，咸以忘怀自逸”^①，所以他们的诗中表现出一份悠闲与雅澹的士族文人的审美情趣。而初唐文人则是在“沟洫可悦”“麟阁可玩”“丰镐可游”的前提下，还不忘警戒自己“释实求华，以人从欲，乱于大道，君子耻之”^②。唐太宗及其重臣们赋予文学作品更多的社会功用与居安思危意识，不是像齐梁士族文人那样，将文学艺术仅仅视为纯粹的消遣与审美的工具，而是在文学欣赏与把玩的同时，不忘忧患，从而使这一时期的诗文创作与齐梁诗歌相比，表现出更多的社会责任意识和积极用世的心态。

其次，这一时期的文人大都目睹了唐王朝建立的整个过程，甚至不少人亲自参与过其中的军事斗争。在这样的背景下，战争便不可避免地成为他们诗文创作的重要表现内容。他们在诗作中抒怀言志，强烈的功业心态使他们的作品充满了蓬勃奋发的气势，如唐太宗《饮马长城窟行》《执契静三边》、窦威《出塞曲》、魏徵《述怀》等。这种刚健遒劲的心态是只知一味偏安的齐梁士人无法体会和难以企及的。

再次，在对待南朝文风的态度上，这一时期的文人并非毫无原则地一

^①[梁]萧绎：《全德志论》，见[清]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梁文》卷十七，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3049页。

^②[唐]李世民：《帝京篇序》，见吴云、冀宇编辑校注《唐太宗集》，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页。



味继承与模仿。一部分文人已经开始客观地看待这一风气并对其柔弱绮靡的作风进行自觉地批判，如魏徵、杜淹等。这一现象的出现固然与他们萌生越来越强烈的庶族寒士意识有关，同时也昭示着文人心态的转变。在这种老调与新声的同奏下，在唐代第一个30年中，尽管艺术风格表现出向齐梁文风的回归与认同，但是由于创作主体的心态和时代背景的变化，文学作品的精神面貌已经产生了较为明显的改观。唐太宗及其重臣开创的事业及政治环境的更新，更是激发了下一代文人对建功立业的向往与想象，这对文人心态的影响是极其深刻的。因此，这一时期的文风与文人心态在精神内质上比齐梁文风还是要刚健遒劲得多，远非齐梁文人心态所可比拟。

（一）御用品格与取悦心态

杜晓勤先生认为：“唐初宫廷诗坛以南风为主的创作格局，首先和宫廷诗人们对南朝士风的普遍推崇、认同分不开，而南朝士风在贞观中得以风行又是因唐初独特的政治格局，唐太宗的用人政策、文化政策影响所致。”^①杜先生的观点是完全正确的。初唐第一代诗人，如虞世南、陈叔达、袁朗、褚亮、谢偃等都是三朝元老；杨师道、许敬宗、孔绍安、陈子良、李百药等都是两朝重臣；而魏徵、长孙无忌、马周、上官仪又是当朝新贵。这些文士有的是政治家，甚至居宰辅之尊，有的是皇帝的文学侍从。他们皆生活于宫廷，由于他们之中的绝大多数人生活视野狭窄，又接受了南朝诗风的影响，因而其诗作内容贫乏，缺乏强烈的感情，而在词采上华饰雕琢。他们写的大量应制应诏奉和之作，既没有真实感受，又缺乏真情实感。写诗似乎并不是他们自身抒情言志的需要，而是应帝王之需以显示自己的学问和技巧，从而博取帝王欢心的手段。如许敬宗今存诗27首，其中20首便是奉和之作。杨师道、上官仪等人的诗作，也有一半左右为应制奉和之作。唐太宗有一首《正日临朝》，奉和此诗的便有颜师古、魏徵、岑文本、杨师道、许敬宗、李百药等人。唐太宗的《春日望海》《秋日即目》等诗也多有和作。唐太宗的《过旧宅二首》，抒发了一种汉高祖成就帝业之后还乡的情怀，许敬宗、上官仪的《奉和过旧宅应制》二诗便将太宗比为汉高祖以颂美。二诗思路颇为一致，皆用典故，雕琢词藻，与梁陈的应诏奉和之作并无什么不同。这一代诗人普遍具有的这种御用品格与取悦帝王的心态，

^①杜晓勤：《初盛唐诗歌的文化阐释》，北京：东方出版社1997年版，第148页。



就使得他们在写诗时很难有个性流露，没有风格的变化与差异，也没有自己的创作个性，更难唱出宏伟的声音或发出不平之鸣。他们的诗作看不出广阔的社会生活与作家个性上的差异，往往表现出趣味小巧而细腻，在创作技巧上雕琢，这自然不可能开拓出诗歌创作的新局面。

应制、奉和之作反映了这一阶段诗坛的南朝余风，而描写宴乐生活与闺阁情趣，也是这一阶段梁陈宫廷绮靡诗风的余波。

唐太宗及其重臣们大都写过宫体诗。据《新唐书·虞世南传》记载，有一次唐太宗写了宫体诗要朝臣赓和，虞世南谏阻道：“恐此诗一传，天下风靡，不敢奉诏。”虞世南有这样的担心，这表现出他的政治眼光和忧患意识。但是，更多的文人则是随唐太宗马首是瞻。在唐太宗的影响下，当时许多文士都写过宫体诗。如长孙无忌的《新曲二首》、褚亮的《咏花烛》、杨师道的《初宵看婚》、阎立本的《巫山高》等。在这种风气影响下，许多北方文士在生活作风与心态方面也表现出柔弱绮靡的特点。王世贞在《艺苑卮言》中就说过：“唐文皇手定中原，笼盖一世，而诗语殊无丈夫气，习使之也。”所谓“无丈夫气”，是说他的诗风、文化心态与其雄才大略、驰骋疆场的英雄豪气不相吻合。之所以如此，王氏以为“习使之也”，也就是自觉地向南朝齐梁文化认同与回归的结果。又如长孙无忌系关陇军事集团八大柱国后代，也是唐王朝的开国元老，唐太宗赞其“聪明鉴悟，雅有武略”^①。然而，就是这样一个“雅有武略”的重臣，其文化心态却表现出十足的南朝绮靡特征，其诗作更少“丈夫气”。其《新曲二首》，格调与南朝吴歌殊无二致。字面冶艳，情思淫靡，诗境也更像齐梁宫体诗，秾丽而轻艳。郑世翼的《看新婚》也完全是一首庸俗的色情诗，其《见佳人负钱出路》趣味就更为低下了。李百药的《妾薄命》《火凤词二首》皆撷拾梁陈艳诗之余沥而成。萧德言，史称其“博涉经史”，“晚年尤笃志于学”，“每欲开五经，必束带盥濯，危坐对之”^②。就是这样一个一本正经而有点迂腐气的文士，写起宫体诗来，丝毫不减当年的徐、庾。其《咏舞》诗轻艳、丽靡，置之梁陈宫体诗中，足可乱真。由此可见，这一时代文士们的文化心态普遍表现出向南朝绮靡轻艳文化的认同特征。

此外，这一阶段文人向南朝齐梁文化的认同心态，还表现在他们的一

①[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长孙无忌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448页。

②[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萧德言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952页。



些关于宫廷、台阁、山池的大量景物描写的宴乐诗中。尤袤《全唐诗话》卷一说：“太宗尝谓唐俭：‘酒杯流行，发言可喜。’是时，天下初定，君臣俱欲无为，酒杯善谑，理亦有之。”^①这不但为我们提供了唐太宗为宴饮之风推波助澜的证据，而且揭示了唐太宗之所以倡导宴饮诗的时代文化心理。在这种风气与心态作用下，当时许多重臣皆以宴饮诗酒为乐，创作了大量的具有齐梁诗风的宴饮诗。

贞观年间两次大规模的宴集，一次是在于庶子（于志宁）宅，一次是在杨师道的安德山池。在于庶子宅宴会上写诗的有：于志宁、令狐德棻、封行高、杜正伦、岑文本、刘孝孙、许敬宗等。在安德山池赋诗的有：褚遂良、杨续、刘洎、岑文本、许敬宗、上官仪、李百药等人。这些诗从取材到艺术表现皆因袭齐梁余风，崇尚雕饰，了无生气。封行高便明言自己的诗是“丽藻穷雕饰”。这里我们以杨师道为例来说明。贞观十年，他代魏徵为侍中后，每“退朝后，必引当时英俊，宴集园池，而文会之盛，当时莫比”^②。刘洎《安德山池宴集》“平阳擅歌舞，金谷盛招携”，以石崇的金谷宴集比况这次宴会。刘诗又云“已均朝野致，还欣物我齐”，则又说明与会者的心态与齐梁宫廷诗人无异。而令狐德棻的《冬日宴于庶子宅各赋一字得趣》“放旷山水情，留连文酒趣”则典型地反映了这些文士普遍乐于宴饮酬唱、游赏山水的时代风尚。这种时代风尚自然是与唐太宗的提倡分不开的。《旧唐书·杨师道传》说：“太宗每见师道所制，必吟讽嗟赏之。”

总之，由于唐太宗对南朝文化的钟爱与提倡，从而使得这些宫廷文人表现出明显的御用品格与取悦心态。他们虽然为朝廷重臣，甚至胸怀武略，曾驰骋疆场，但当唐建国后，其文化心态明显地表现出对南朝齐梁文化的认同。在这种潮流与心态的制约下，他们的诗作自然沿南朝余绪而很难有所突破了。

（二）创业精神与盛世情怀

尽管唐太宗及其重臣们极力学习仿效南朝齐梁文化，文风绮靡，但已经改造了南朝那种颓废的情思，而表现出某些新的文化内质。他们毕竟与南朝君臣苟安取乐的文化心态大为不同。他们是一些建功立业的人物，是

^①[宋] 尤袤：《全唐诗话》，见 [清] 何文焕辑《历代诗话》上册，北京：中华书局 1981 年版，第 65 页。

^②[后晋] 刘昫等撰：《旧唐书·杨师道传》，北京：中华书局 1975 年版，第 2383 页。